

当代中国文学学家文库

曹湜

卷

比较文学与文论话语

——迈向新阶段的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

DANGDAI

HONGGUO

HANXUEXUEJIA

WENKU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当代中国文学学家文库



比较文学与文论话语

——迈向新阶段的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比较文学与文论话语——迈向新阶段的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 / 曹顺庆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1
(当代中国文学学家文库)
ISBN 978-7-303-11275-3

I. ①比… II. ①曹… III. ①比较文学—研究②文学理论—研究 IV. ①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40339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8006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55 mm × 235 mm
印 张: 23
字 数: 358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6.00 元

策划编辑: 赵月华 责任编辑: 赵月华 张若溪
美术编辑: 毛 佳 装帧设计: 毛 佳
责任校对: 李 茵 责任印制: 李 啸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比较文学与学术创新

——曹顺庆先生访谈录(代序)

曹顺庆，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国家级名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四川大学杰出教授

朱利民，浙江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

朱利民：曹老师，您好，您是我国第一位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博士，从硕士论文《〈文心雕龙〉中的灵感论》到博士论文《中西比较诗学》再到现在的比较文学“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国家级教学名师，经历了较为明晰的学术转向，学界对您的了解和关注更多的也是在比较文学方面，您能谈谈您早年在中国古代文论方面的研究吗？您如何看待您的学术转向呢？

曹顺庆：谈到转向，其实我个人的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我16岁考上文艺兵，在部队文工团先拉二胡，后拉小提琴。1976年，作为最后一批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我被推荐到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文学评论专业学习。当时复旦大学有一批资深的名教授，如郭绍虞、刘大杰、陈望道、朱东润、蒋孔阳等，都是大师级的人物，因此，复旦大学的古典文学研究在国内是首屈一指的。正是在学术大师魅力的感召和浓厚学术氛

围的影响下，我从一名工农兵学员出身的古典文学热爱者，经过几年踏实的学习，慢慢成长为一名有志于古典文学研究的青年。大学期间，我就写了一些研究古代文论的文章。记得第一篇文章是关于孔子的美学思想的，曾经请蒋孔阳、王运熙等老师看过，经过他们的指导和修改，后来收录在复旦大学一个学生论文集里。1980年毕业的时候，我打算考研究生，一则出于对古代文论的研究兴趣，想挑战一下自己；二则年轻气盛，想改变一下人们对我们工农兵大学生的印象，因为当时很多人对工农兵大学生存在明显的偏见，认为工农兵学员都是“白卷英雄”，是当时制度下的产物。但是，由于当年复旦大学这个专业不招生，只有四川大学的杨明照教授招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硕士，杨先生是古代文论研究的名家，所以我就报考了四川大学。刚到四川大学的时候，杨老师给七七级的大学生上《文心雕龙》，我就跟着旁听。杨老师上课只带一个小笔记本，上课时先把《文心雕龙》原文背诵一遍，然后再逐字逐句地讲解。杨老师的记忆力很好，听课的学生都很惊讶。要知道，当时杨老师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杨老师学术功底很扎实，治学严谨。他的书房叫“学不已斋”，记得我每次去找杨老师的时候，他每次都在伏案写作，桌上放着一套《十三经》。我后来曾经写了一篇《知无涯，学不已》的文章来介绍杨老师，也是激励自己秉承杨老师严谨勤奋的治学精神。我把自己拓宽古代文论研究路子的想法告诉杨老师之后，他很赞同我的看法，认为在目前这样一个语境下，典籍校勘的治学路子继续研究古代文论已经不好走了，不妨把视野放得开阔一些，可以尝试着走走中西比较的路子。而当时的古代文论研究的确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对“风骨”的研究，讨论了近半个世纪，仍然没人把它说清楚，反而越说越糊涂。有人认为“风”是形式，“骨”是内容；有人说“风”是内容，“骨”是形式；还有人说“风”既是内容，也是形式。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后来我干脆不看这些论述了，找原文来读，发现读原文其实很好理解。于是我就想，为什么很好懂的东西反而越说越糊涂呢？西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概念呢？后来我发现，西方文论中朗吉努斯的“崇高”就与之相似，而且将两者对照着解读，原先的困惑顿时豁然开朗。那么，能否沿着这样的思路，进一步拓深我们的古代文论研究呢？怎样更好地吸收西方文学理论的精华为我们的古代文论研究所用呢？这样，我就慢慢形成了比较清晰的中西比较的思路，并且开始自觉地走中西比较的路子。1981年发表

在《江汉论坛》上的《亚里士多德的“Katharsis”与孔子的“发和说”》是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也是我进行中西比较诗学的开始。后来，我又相继在《文艺研究》《学术月刊》等刊物上发表了《物感说与模仿说》《论西方现代派文艺与中国古代文艺表现说》等多篇文章，都延续了这样的学术思路。我的博士论文选择了中西文学理论的对照研究，就是后来出版的《中西比较诗学》，它是大陆第一部以“比较诗学”命名的专著。该书出版后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肯定，更加坚定了我在比较诗学方面努力的决心。从那以后，我就一直没有放弃过比较文学的研究。1992年至1994年，我先后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和哈佛大学任访问学者。这期间，我结识了著名学者艾布拉姆斯、宇文所安、乔纳森·卡勒，深切地体验了西方文化。通过这种方式，我对西方的文化和学术大致摸了个底。1994年回到四川大学之后，我结合在美国的一些感受和国内的研究现状，进行了一些思考。当时酝酿的主要有两个问题：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和“失语症”及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后来发表的《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东方丛刊》1995年第3期）《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初探》（《中国比较文学》1995年第1期），对“失语症”、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以及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这些文章后来都引起了讨论，引用率很高，但这些文章实际上都是1994年写的。这两个问题展开了我学术上最重要的两个方面：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和“失语症”以及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这些年我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渐渐形成了以师生为主的一个学术群体。

朱利民：您的比较诗学研究使您成为新时期比较诗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但我注意到，1991年，您还出版了《比较文学史》，似乎又转到了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讨，而且后来还出版了《比较文学论》《比较文学学》《比较文学教程》等专门探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教材。您能谈谈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感兴趣的吗？

曹顺庆：可以。对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研究是我自己都没想到的。说实话，我的兴趣主要在比较诗学，我还有一些重要的比较诗学写作计划没有展开，不愿意分散精力。但是，在近些年的研究中，我发现比较诗学中的许多问题都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密切相关，不搞清楚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比较诗学研究也无法真正深入展开。在研究中，我逐渐

发现，中国当前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一个严峻问题是缺乏自己的、切合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的学科理论。正是这种理论的缺乏，导致了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许多问题以及学科发展上的徘徊与茫然，甚至导致学科发展的危机，如浅层次的比较和“X+Y”的比较。因此，我决心下一番工夫研究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希望能够解决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由此，我开始了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国化的探讨。我发现，一些问题的出现并不是因为原有的学科理论发生了错误，而是原有的学科理论不能适应中国现状了。以前的法美学派都是在同属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欧洲文化圈内进行比较，在跨越了中西方文明之后已经变得有些水土不服。也就是说，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必须有自己的学科理论才能解决中国自己研究中存在的问题。1995年，我发表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初探》一文，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理论特色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后来，我又提出了比较文学的“第三阶段学科理论”、“失语症”、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变异学、跨文明研究以及文学的他国化、西方文论的中国化等理论，试图在解决学科理论问题的基础上解决比较诗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朱利民：您刚才提到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要有自己的学科理论，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与您曾经提出的“失语症”问题有着某种一致性。“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和“第三阶段的学科理论”的提法已基本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但是，关于“失语症”的问题却一直处于争论之中，您对这种争论有何看法？

曹顺庆：“失语症”一石激起千层浪，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其引起的学术论争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个口号本身。支持者认为，“失语症”的提出触及当前文学理论界的要害并有利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也有持反对和不同意见的。比如，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文艺学从古代到现代只是发生了“转换”而没有发生“断裂”，所以“失语症”无从谈起；有的学者认为，提出“失语症”是一种“本真性幻觉”和“全盘西化幻觉”，并且是“文化原教旨主义”“文化复仇情绪的典型代表”；还有的学者明显对“失语症”产生了误解甚至是曲解，直接将“失语”看成是没有学问，误解了我当初提出“失语症”的目的。很多研究古代文论的大家也同样“失语”了，这些人的功底不能说不好的，为什么也“失语”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话语，没有自己的言说方式，采用的都是西方的言说方式，如

“白居易是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的争论、对于“风骨”的论争等。对“失语症”的误解和反对其实也恰好说明，一些学者在话语言说方式和思维方式甚至是学术规则上都已经西方化了，与中国传统和本土的学术现实及现实关怀严重脱节。这种现象不仅在文艺理论界存在，在比较文学界也同样存在。其实，这也是中国文化的现状。

朱利民：您刚才谈到中国文化的问题，您在比较文学研究中也主张文化探源式的研究，这说明，您的学术研究领域在不断地扩大。

曹顺庆：是的，就我个人的兴趣而言，仅仅关注比较文学的学科研究是不行的。因为，比较文学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领域，它需要研究者具有广泛的知识 and 深厚扎实的学术功底，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加强自身的学习，不断拓展知识的深度和广度，这样，才能在中西或东西方的比较中游刃有余。比如，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方法论体系中有一个方法是文化探源研究，这就要求对比较的双方都深入到其背后的深刻文化领域，揭示其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否则就会流于表面的比附。同时，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和学理背景都要求我们在文、史、哲各个领域都有一定的了解甚至是有较深的造诣，因为文、史、哲本来就是相通相连的，缺少哪一方面的知识都不可能做好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院系调整，使得中国的学术过于学科化和单一化。就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来说，文、史、哲的分家造成学生只懂得自己所学的那个学科的知识，甚至同一学科的分割也造成彼此之间的隔阂。比如，搞外国文学的不懂中国古典文学，搞中国古典文学的不懂中国现当代文学，造成学科之间的条分缕析，不能向学科外延伸。而当今科技和学术发展趋势要求的是科际交叉和跨越，这样才能做到真正的学术创新。比如，赛义德的《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相信大家看过或者有所了解，这些著作看起来像是关于政治或是文化的，但是，赛义德却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系的教授，他的很多著作都超出了文学的范畴。这就告诉我们，学术的创新必须具有广泛的知识 and 兴趣。在21世纪的今天，国家将人文社会科学的地位提高到与自然科学同样的战略地位，提倡建立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人文学术，倡导建立中国学派，强调走自己的路，发出自己的声音，增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那么，学术的自主创新就成为最核心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意识。

朱利民：的确，问题意识对于学术创新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对人

文社会科学领域来说是重要的，对于科学领域甚至整个学术研究领域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没有问题意识就无法进行学术创新。但是，问题意识的提出仅仅迈出了学术创新的第一步或者说仅仅明白了自己要迈出第一步，而这第一步该如何迈出却是一个未知数，就像大海上迷途的船只，当它从迷途中惊醒的时候明白了自己应该摆脱这种状态，可是该如何摆脱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学术创新第一步的迈出是艰难的，但却是必需的。您能就中国学术创新迈出的第一步谈谈看法吗？

曹顺庆：问题意识的出现对于学术创新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问题意识的出现仅仅是一个信号，如何对待问题意识才是关键。人文社会科学有着自己独特的逻辑，与我们平常说的科学技术不同，科学技术的创新是可以实验来检验的，但是，人文社会科学则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在某种意义上讲永远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因为科学技术的研究对象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外国都是大致相同的，而人文社会科学在不同的国家、民族、地区有着不同的表现和特质，它们之间有着跨越异质文明的本质不同，所以，人文社会科学在不同的地方遇到的研究对象是不同的。但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与自然科学的创新也有着相同的地方，那就是都必须有着深厚的学养和知识积累，都必须向先进的东西学习，都必须融汇中西。对于人文社会科学而言，由于20世纪中国文化大河改道的冲击，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先进的，尽管近年来有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西方有比我们先进的地方，这是肯定的，因此，当我们的问题意识被唤醒的时候，想到的往往都是要向比自己先进的东西学习，学习西方也就成了我们进行学术创新必须迈出的一步。拿比较文学“第三阶段的理论”来说，我曾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中对比较文学第三阶段的特点进行了概括，其中一条就是跨异质文化。比较文学的前两个发展阶段是在同一文明圈内进行的，而一旦突破这个文明圈，原有的学科理论就不行了，比如，美国著名的比较文学学者韦斯坦因坚决反对将文学的比较扩展到两种不同的文明。而中国一开始面对的就是不同的文明，所以，没有这个意识，只是一味地求同是不行的，还必须求异。以前是求不同中的“同”，而现在求不同中的“不同”，而且要放在最为重要的位置。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不要向西方学习了，因为，前两个阶段的学科理论，如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形象学研究等，还是可取的，并不是一无是处。这些理论可以

拿过来作为我们学科理论的一部分。因此，学习西方一可以积累我们自己的知识，二可以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实现我们自己的创新。

朱利民：学习西方是必要的，因为，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西方在很多学科领域仍然保持着领先地位，不向西方学习，我们就做不到有的放矢，也不可能实现自主创新。但是，向西方学习使得我们在很多方面在向西方求“同”，而不是您刚才谈到的“不同”，比如文化上的好莱坞现象、美国快餐文化的泛滥等，甚至由于学习西方现在居然有人提出要废除中医。可以说，我们向西方学习了很多，但是，我们发现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

曹顺庆：你说的没错。这种现象就要求我们尊重双方的不同之处，亦即“异”。但是，一味地强调异质性也有危险。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过犹不及”这句古训在今天仍然没有过时。对于异质性的强调也要防止过犹不及，因为任何事情都是不同的，在这种前提之下，求异就变得没有意义可言。因此，求异的前提是互补性，它是潜藏在比较文学之中的，不互补也不行，因为比较文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实现文学之间的互补，这突出地体现在比较文学中的文学变异学的研究中。因为任何一个事物在被传播和接受的过程中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变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认为翻译文学不是外国文学，于是在《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中出现了“翻译文学”，而翻译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的变异和转型起到的作用是人所共知的。故而，异质性与互补性总是存在的，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形象学研究也是如此，人们常说的译介学、创造性叛逆，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从异质性和互补性的角度说的。

朱利民：对异质性的强调已经成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一个突出特征，中国人文学术的创新也需要在异质性的基础上进行。对异质性的讨论也成为近年来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但是，对异质性的把握却并不是每个学者都能拿捏得恰到好处的，曾经出现的盲目排外的现象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但是，如果不是盲目地排外，如果要在强调异质性的基础上致力于学术创新，我们如何才能做到呢？

曹顺庆：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为何要谈“失语症”。你刚才提到的盲目排外是对盲目迷信西方的一种反拨，对崇洋媚外的反拨是对的，但是也不能盲目。以前，我们的学术一味地向西方看齐，不敢甚至不愿走自己的路，最后连走自己的路的意识也没有了，学术创新也就成

了一句空话。以前学术上跟着西方走，我们不会说自己的话，谁的外语好，能介绍什么，我们也就只能了解什么。谁掌握了这种翻译介绍的话语权和学术制度，谁就是学术的权威，西方是大权威，我就是小权威，你们就都是应声虫，所以产生了介绍西方文论的热潮，各领风骚三五年。当然，介绍西方文论的不一定都是这种心理使然，对西方的介绍是必需的。但对西方的盲目崇拜造成了严重的失语状态，最终丢掉了中国自己的传统，鄙视甚至仇视中国文化。这是对中国学术创新的严重伤害，只有抛开了这种心态，我们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创新。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创建过程就体现出这样一种创新的思路。现在，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第三阶段学科理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慢慢为众人所认识和接受，现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的乐黛云教授在凤凰卫视的演讲就是以“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为题的。这充分说明，我们的思路是对的，这可作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创新的一个典型案例。

朱利民：虽然对于学术创新是大家一致赞同的，可对于创新的路径却是人言言殊，在这一点上似乎永远都不可能取得一致的看法。您刚才谈到，要实现学术创新必须强调中西学术或是东西方学术之间的异质性，可以说这是抓住了学术创新的关键点。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做到对异质性的强调，或者说如何才能发现异质性？您强调要向西方学习，但是向西方学习只是我们对西方的认同过程。在您看来，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如何才能发现异质性？

曹顺庆：你的问题很好。向西方学习是必需的，是学术创新的必备条件，但不是唯一的条件，也不是主要的条件，主要条件在我们自身。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可以结合“失语症”的问题来谈。我之所以说我们处于“失语”的状态，并不是说我们会不会说话了，而是说我们会不会说自己的话了，我们说的话都是“洋话”，我们如果抛开西方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概念，古典文学的课该怎样讲呢？恐怕古典文学课将难以讲下去了，而古人讲古典文学没有用这些术语反而好懂。因此，我们必须找回自己说话的方式。具体而言，就是要找回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知识。五四之后的中国文化和学术走上了西化的不归路，使得我们处于严重的“失语”状态，我们发现自己永远都是跟在西方后面而且永远超不过他们。这种大河改道的结果是，今天我们不仅忘记了自己的传统，而且被世界学术抛在了后面。于是，我们转而寻求传统文化的资

源，当今的“读经热”“国学热”就是这种思想的反映。因此，我认为，这是中国文化又一次转折的信号，是一种历史的潮流，它应当成为我们当前学术的热点和前沿课题。就我个人而言，早在1995年，我就在研究生当中开设了“中国文化元典《十三经》”的课程。在我看来，首先，学习古典文化能够使我们摆脱失语的状态，因为传统文化蕴涵着中国独有的话语和学术思维方式，只有深入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借鉴西方资源的时候才能立足于本民族的话语和学术思维方式，才能真正将西方文化为我所用，从而实现真正的学术创新。其次，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能够找回失落的精神家园。西方有自己的《圣经》，印度也有自己本民族独特的信仰，但是，中国在五四之后陷入了文化的迷茫之中，人们发现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了，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出了问题，因此，必须大力加强对传统文化的学习。

朱利民：是的，传统文化当中的很多精髓是我们单纯的学习西方文化所体会不到的。比如，在学习文艺理论课程的时候，有个术语叫“想象”，老师在讲述这个概念的时候用的都是西方的理论和资源，似乎中国古代就没有“想象”的概念。学习了中国古代文论以后，我们才发现，原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刘勰就曾经专门谈到过“想象”，那就是著名的《文心雕龙·神思篇》。我们就突然觉得，其实西方的东西不一定都比中国的好，尤其是在文化上。还有一个问题，据说，在您的倡导和主持下，四川大学在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中还有一门“中国文学典籍”考试科目，而且是作为报考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必考科目。您对古典文化的提倡与宣传导致有些人说您是在复古，因为中国人被“古”的东西搞怕了，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后来又是“文革”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清洗，导致人们谈“古”色变。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曹顺庆：的确有人这样认为。但是，“古”的东西不一定是坏的，好的东西不一定是“不古”的。围棋古不古？唐诗宋词古不古？昆曲古不古？京剧古不古？但很多人都很喜欢。因此，“古”的东西要看我们怎样看待。西方的确很现代，但是西方也有很古的东西，如西方古老的洗礼，这些都是古代的东西，西方都能保存古代的东西，我们中国为什么不能保存中国古代的东西呢？再如，在当今的中国，研究生毕业都要授学位，而授学位有一定的仪式，但这个仪式却是从西方学来的，不是中国本土的东西。可正是这样一个从西方学来的“现代”的东西却是西方古

老传统中的一部分。那你能说现在的授位仪式不现代吗？一些研究西方文论的学者言必称希腊，满口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似乎这些都是现代的东西，殊不知，这些都是西方古代的东西。为什么我们还要学习呢？难道西方的“古”就不是“古”吗？因此，这里有一个心理问题，那就是唯西方是从。其实，“古”的东西有精华，也有糟粕，而我们需要学习的是精华。西方的“古”也有糟粕，中国的“古”也有精华，关键在我们怎么看。比如，西方人对自己的《圣经》可谓了如指掌，而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了解多少？有些专搞古典文学研究的人甚至都没有认真读过《周易》《尚书》，搞古典的人尚且如此，遑论他人？我们不要怕别人说“复古”，如果真的能够复古的话倒是好事，因为我们找回了中华民族的根。我们所要复的“古”是精华，是有着现实意义的“古”，复古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在于中国的当下现实，包括学术现实和社会现实。有了这个“根”，我们才能找回自己的学术规则，才能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做到创新。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不仅在入学的时候要考中国文化典籍，在入学之后也设有专门的《十三经》的课程，当然，还设有用外文讲授的“当代西方文论”课程，目的就是要学生在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融汇中西，做到真正的学术创新。

朱利民：您对于中国学术创新的看法给我很多启迪，我相信，您的这番话也会给莘莘学子很大的启迪。对于大多数青年学生或青年学者来说，他们也希望能像您一样做一个既做学问又有现实关怀的学者，但是，我发现很多青年学生和青年学者不知道该如何去做。您能给他们一些建议吗？

曹顺庆：其实，中国目前的学术环境可以为青年学生和青年学者提供很好的保障，只是很多人可能还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路子。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智慧和习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学习方法，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想，要实现学术创新必须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必须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不仅是学术创新的关键，也是以后走上工作岗位的关键。而如何打下坚实的基础呢？就必须做到中西皆通。但融汇中西的前提必须是在中国自己的话语和学术规则的基础上融汇中西，做到既熟悉中国传统的东西，又熟悉西方的东西，甚至还要熟悉其他东方国家的东西，并且要将他国的东西为我所用，这才有可能做到学术创新。其次，必须有强烈的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是学术创新的一个入口。没有强烈的问题意

识，就难以有真正的学术创新。没有问题意识，即使你已经融汇中西也难以做到学术创新，因为你找不到学术创新的入口。最后，学术的创新必须为中国的现实和文化建设服务，这就要求我们要培养广阔的胸怀和对社会的人文关怀，只有心怀天下，我们的胸襟才会开阔，才会在学术的领域里驰骋，实现真正的学术创新并为现实服务，这样你才是一个社会意义上的人。

目 录



上篇 比较文学

比较诗学 /

道与逻各斯/3

庄子与叔本华生命悲剧意识比较/18

中国的“文学自觉”与西方的“文艺复兴”/28

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构 /

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41

比较文学定义与可比性的反思与探索/55

从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看文化软实力/67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 /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初探/80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渊源/98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三十年/113

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 /

把握世界学术基本动向与学术前沿：跨文明研究/127

“文明冲突”与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137

跨文化：21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主潮/142

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 /

变异学：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重大突破/145

比较文学学科中的文学变异学研究/158

失语症与现代性变异/168

下篇 文论话语

文论失语症 /

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181

替换中的失落/195

文化经典、文论话语与比较文学/213

重建中国文论话语 /

中国文学理论的世纪转折与建构/224

中国文论话语及中西文论对话/232

重写文学概论/243

西方文论中国化 /

文学理论的他国化与西方文论的中国化/252

中国文论的西化历程/259

论中国古代文论的中国化道路/276

少数民族文学

三重话语霸权下的少数民族文学/296

多民族文学史的编写问题/307

重谈“重写中国文学史”/314

文化经典与大学教育

“没有学术大师时代”的反思/323

中外打通培养高素质学生/330

我们为什么要读《十三经》/336

后 记